史苑拓耕

SHIYUANTUOGENG

唐培吉学术论文集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史苑拓耕

——唐培吉学术论文集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目　　录

序一 …… 张　云　1
序二 …… 唐莲英　3
中共党史研究的十年动态 …… 1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 70
历史的必然——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5周年 …… 99
建党时期值得研讨的几个问题 …… 112
二十世纪中国民主运动的光辉一页——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新议 …… 120
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129
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 137
中华民族觉醒的先声——评述“一·二八”淞沪抗战 …… 143
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 …… 164
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 173
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创建看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 …… 180
新四军与抗日战争——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暨新四军建军70周年 …… 190
新四军东进的重大战略意义——纪念新四军东进70周年 …… 206
抗日战争与上海——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 219
抗战时期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与实践 …… 238
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在史学学科中的定位 …… 252
应该记取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篇 …… 260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 272
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 …… 288

争取和平民主　准备自卫战争(1945 年 8 月—1946 年 6 月) …… 299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35 周年 …… 322
努力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330
扭转乾坤　改换日月——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 …… 335
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认识 …… 346
风雨同舟　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 354
文化战歌 …… 385
学术团体的生命在于提高学术质量——记上海市中共党史
(中国现代史)学会 …… 411
光辉的历史　不朽的功勋——永远跟着党走 …… 416
学习党建学说　加强党的建设——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 …… 43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 …… 439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 4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必然 …… 459
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 471
上海抗日战争史简论 …… 479
论日本对南京的大屠杀是从上海开始的 …… 509
延安学刍议 …… 518
犹太学刍议 …… 527
上海犹商兴衰史 …… 536
巴格达来的冒险家——哈同 …… 549
上海——犹太方舟 …… 564
犹太学研究发展的轨迹 …… 574
专家行述 …… 579
遥遥杏坛路　拳拳挚着情——记唐培吉教授 …… 邓宜红　赵　云 581

附录一　沧桑平生 …… 586
附录二　编著著作一览 …… 588

序　一

唐培吉先生是我最为尊重的师长。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执教鞭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在主讲中共党史等课程时，就已经开始研读唐先生的论著。那时候，唐先生在学术界已经很有名气了。他所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我就曾经读过数遍，受益匪浅。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在国内研究抗日战争史通史类著作中列于首席，他也因此而成为上海抗战史研究第一人，并在中共党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奠定了大师级人物的地位。而后，唐先生以一发不可收的势头，不懈耕耘、努力攀登，在创新和超越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凸显其独特的学术智慧。今天，在迎来唐先生八十华诞之际，上海辞书出版社隆重地推出《史苑拓耕——唐培吉学术论文集》，集其学术之精华，推其发扬光大！

《史苑拓耕——唐培吉学术论文集》除见长于内容丰厚、史料翔实、观点鲜明、视角独特等特点外，本人以为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体现在“拓耕”两个字上。

所谓“拓耕”，关键在于敢为天下先。综观唐先生的学术成果，诸多篇目均列于同类之首。如上文所述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以及《两次国共合作史稿》、《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等，在同类著述中名列前茅，为同行之先。

所谓“拓耕”，核心在于敢为天下新。创新是学术研究的不竭源

泉。唐先生参与学术研究活动，始终致力于新学科的开拓，被学术界传为佳话。他在《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要建立“上海学”，呼吁学界关注。他在《延安学刍议》、《延安学的核心内容——群众路线》等文中，首次提倡“延安学”，为“延安学”的问世揭开了序幕。他在《犹太学刍议》、《犹太学研究发展的轨迹》等文中，又倡导“犹太学”。他接二连三地思考新学科的建设，既体现他可贵的学术创新精神，又展示了他坚定的使命意识。

所谓“拓耕”，重要的还在于敢为天下争。作为学术界的大家巨擘，唐先生不拘泥于现成的结论，不重复于前人的定律，而是敢于思考、勇于争辩，旨在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探索客观的发展轨迹。他在《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与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认识》等文中，对诸多传统说法给予新的判定，有根有据，入木三分，令人折服。

《史苑拓耕——唐培吉学术论文集》还是唐先生处世哲学、道德文章的又一个写真。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作为后学，我不仅敬仰他的学问，更敬仰他的德行。他做人的襟怀坦荡、对人的诚恳友爱、治学的态度严谨和对学术研究的锲而不舍，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导　张云

2009年3月31日于上海五角场寓所

序　二

每次出席华东七省市党史学会年会的上海代表中总会出现一位满头银发、气质不凡、充满魅力的先生，在上海党史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的主席台和发言席上也经常可以看到这位先生的身影，他就是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先生。今年是唐先生八十华诞，先生的学术文集《史苑拓耕——唐培吉学术论文集》出版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喜事。

年初，先生提起想让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我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先生这样信任我，为难的是我作为一名晚辈，学识浅薄，能否为中共党史学界这位德高望重学者文集写好序，的确没有把握。这种矛盾心理使我迟迟未能动笔。眼看就要到先生生日了，只好静下心来认真撰写。我想，无论怎样把我对先生的印象写出来，也算是为他八十大寿尽一份心意并表达对他的敬意。

唐培吉先生是“文革”后上海第一批晋升教授的，但我们很少称他教授，觉得称老师更亲切。在上海社科界尤其是在党史界可谓耳熟能详。我认识他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那是作为高校的政治教师参加党史学会的研讨会，唐老师作为党史学会的会长主持会议，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对他是敬而远之的，总是坐在会场的后面，洗耳恭听专家学者的高谈阔论，每次总有收获。真正和唐老师相识是在1998年秋天，他带领我们一行六个会员到安徽潜山参加华东七省市党史学会年会，使我开始近距离了解先生。我感受很深的是，他比我年长20多

岁，当时已将近70岁，可是爬山走路比我都快，我自感不如，还有他的健谈、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学术造诣等都令我赞叹，也一下子使我们拉近了年龄和思想感情的距离。他先后任职三届，成为上海市党史学会成立以来担任会长时间最长的会长。在党史学会这个群众性学术团体，我先后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有幸直接在先生的指导、帮助和关怀下工作成长。先生还长期担任新四军学会副会长职务，我又有幸在新四军学会与先生一起从事新四军历史的研究，难怪有同事问我：唐老师是不是你的亲戚，我想虽没有亲戚关系，但却结下深厚的情谊。转眼间10多年过去了，先生已经不再担任党史学会会长一职，但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参与学会工作。每会必参加，到会必发言。我深深感到能在这位先生身边工作学习这么多年真是一件终身受益的事，也是一个多么幸运的经历。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敏锐的思维、和蔼的态度、惊人的记忆、渊博的知识，这些都令我佩服不已。这绝不是恭维话，而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同仁的共识。

在与先生的接触中我钦佩他的学识，尤其是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可谓上海学术界的泰斗。为方便写序，我有幸先睹了唐老师的文集稿，这本文集时间跨度长达30年，在他八十岁的时候，还不断出现新成果、新思路、新观点。透过这本文集，看到唐老师的学术研究全景，可以用专、广、精、杂四个字来形容。专：唐老师以研究抗日战争史擅长和著名，在他100多篇论著中有四分之一是研究抗日战争的，他领衔的《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曾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广：唐老师研究的面非常广，在他整整30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从中国近代史到中共党史，从中日关系到中美关系，从上海学到犹太学，涉及的领域很广泛，有的走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有的至今仍然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精：唐老师在学术上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密切关注和跟踪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动态与进展，先后撰写了《中

共党史研究综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国外对我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动向》、《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犹太学研究发展的轨迹》等，为学界的研究不断提供新的信息和扎实的基础。另外，还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两次国共合作史稿》、《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上海犹太人》、《上海抗日战争史通论》等等学术专著。杂：唐老师一生以研究为乐，探讨研究的内容似乎很杂，既有历史的追问，又有理论的思考；既有事件的演变，又有人物的述评；既有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有相关教材和学习提要，凡此种种，透露出一种对学术的执着，对社会的责任。我由衷佩服老人追求学问，常抓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尤其令我佩服的是当电脑成为年轻人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时，已经年近七十的他，开始学习电脑，并熟练掌握了五笔法打字，很难想象他所有的文章、著作都是出自于老人之手。不知是否打电脑可以健脑，老人年年都承担宣讲任务，从来没有看到他念过讲稿，他的发言、讲话和报告如细细流水清澈见底，干脆利索，因而许多同仁称他为学术上的常青树。

我对唐老师最为敬佩的是他作为长者的优良品质。他学术造诣深，影响大，这在史学界是有目共睹的，但与他在一起，从没有感到他有任何傲慢之感，从没有架子，不倚老卖老，因此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压力，相反会给予我们许多教诲和引导。他对中青年学者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为我们的成长提供平台和机会。由于他在党史学会团结了一批学术同仁，无论是学术水平、身体状况我们都希望他能继任会长一职，他坚持要扶持中青年进入工作班子，他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让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参与学会领导工作。他总是鼓励我大胆开展工作，当遇到问题时，他总是出主意帮助解决，出现矛盾，他主动出面调解，从大局出发，从工作出发，不求个人名利。我们称他为党史学会的凝聚剂，年轻学者的表率。学会每年都要召开迎春茶话会为老同志拜年，是唐老师发起组

织的，这个活动延续了多年，现在与学术活动结合在一起，成为“资深专家论坛”，既激发了学会老同志的热情，又发挥了他们继续研究的积极性。这个活动已经成为学会的传统和特色。

先生的人生经历，对我来说真可谓“所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在新中国建立前先生就参加了革命，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在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等从事教学与研究，他的足迹遍布上海、北京、美国和日本。我与先生接触十多年，没曾听到过他讲自己的荣誉和成就，对自己的那些奖项也从没有任何炫耀，就连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也鲜有人知道。我透过先生的所作所为，深受感动。我觉得唐老师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可贵精神正是值得当代中青年学者学习的。

唐老师文集的出版既是他学术研究成果的荟萃、人生经历的回忆，又是一本革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更是一位党史工作者、一位政治理论教师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奋斗历程的真实记录。正如他的座右铭：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做爱国爱民的实事。我从中不仅深切体会到什么是学术质量，什么是科研水平，什么是理论功底，更深切体会到什么是为师之道，什么是生命价值，什么是榜样力量，什么是理想信念，什么是人格魅力，这本论文集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总之，唐老师是我一生中最爱戴和最崇敬的学者和前辈；唐老师的《史苑拓耕——唐培吉学术论文集》必将是我一生中最喜爱阅读的一部精品力作。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唐莲英

2009 年 4 月 25 日

中共党史研究的十年动态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是全国党史研究空前活跃繁荣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年。全党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高潮有过两次，第一次是整党和“七大”，第二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预计在今年纪念建党七十周年以后，将会掀起第三次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高潮。近十年来党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 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为用科学态度研究建国后的党史开辟了道路，而且为研究建国以前的党史拓宽了领域。党史界清除了“左”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影响，拨乱反正了一些冤假错案和历史事件，冲破了一些“禁区”，使党史研究从狭小的圈子中解脱出来，在中国社会和世界革命的客观环境中进行观察，从而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

2. 党史资料开始大量编辑出版，为党史工作者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央党校等编了各种资料，而且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区、县也汇编了许多地方史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党史学者是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取得更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3. 党史论著大量发表，十年的数量远远超过前三十年的总和。其中有许多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有的填补了过去研究中的空白，有的将以往没有弄清楚的历史问题弄清楚了，有的将一些党史问题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4. 形成一支相当宏大的比较稳定的有一定质量的党史教学和研究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由六个方面组成的，即：各级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军队的党

史工作者；大专院校的中国革命史教师；各级档案馆党史工作者；中央和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的党史教员。

5. 建立了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各省、市、自治区中共党史学会，组织党史学者专家，开展各种活动，如举办学术讨论会和党史讲习班，举行有关党史的各种纪念活动，编纂和出版党史论文集，学会之间开展横向协作活动等等。

但是，近几年来，党史领域中亦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主要是：1. 以党史为题材搞所谓的纪实文学作品。如《乌托邦祭》、《康生外传》、《林彪传》、《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苏晓康、林青山等均不是党史工作者，他们歪曲党史、捏造事实，又加文学描绘、形象比喻，具有欺骗性和蛊惑性，危害极大。2. 借助学术批判为名向党挑战。如金观涛写的《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刘晓波写的《选择的批判》等。3. 在动乱中张贴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如《共产党描述》、《对共产党历史的反思》等，恶毒攻击党和党的领导。4. 在党史教学和研究中出现反常情况。对民主革命的胜利研究少，对出现的曲折和失误探讨多；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肯定得少，对出现的失误讲得过多；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胜利和发展宣传得少，对传播中出现的问题议论得多；对共产党人领导加以贬低以至否定，对国民党的作用则加以夸大和歌颂等。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 1989 年提出的“三个反思”：

五四运动七十年的反思——选择马克思主义对不对？

新中国 40 年的反思——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

改革开放 10 年的反思——选择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方针政策对不对？

当时，所谓学术界的“精英”们均对这三个反思持否定的态度，并发表了很多谬论。因此，目前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党史领域中的消极影响。

五四运动的研究动态

五四运动至今仍是当前党史学界争鸣的热点，大致可归纳为三大问题：

一、对五四运动的不同评价

1. 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它促进马列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好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2. 五四运动只有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民族危机冲击了民主和科学。“科学与民主精神被冷落，对五四精神认识长期停留在朦胧而模糊的低级水平上”，“在革命成功后，没有做好这一工作”，“始终没有创造出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前提，没有创造出民主发育、科学昌明的社会机制”。

3. 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出现了断裂，有卖国主义的存在和封建主义的泛滥（“文化大革命”集中反映了封建主义的泛滥）。

4. 怀疑五四运动选择了马列主义是不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认为如果能选择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主义就好了。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1.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当前国际文化动向是东方向西方学习物质文明，西方向东方学习精神文明，西方学者正在掀起学习中国孔孟之儒学和老庄之道教。因此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是历史性错误，把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造成今天的民族素质和民族道德的下降。

2. 认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与否？必须放在民国初年那个年代去考察。辛亥革命废除了祭孔和读经；袁世凯、北洋军阀则把孔教定为国教，将保皇和尊孔相结合。问题不在于民众要打倒孔家店，而在于统治者利用孔子来实行高压，在新旧思想对峙下，要打倒旧礼教，矛头就必定对准孔子。新人物提出打倒孔家店，并不否定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价值。（南开大学历史系魏宏运教授）

3. 认为把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五四运动是对优秀文化传统的进一步改造和弘扬的标志，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不能和封建文化划等号，更不能和“孔家店”划等号。传统文化应是多层次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历来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从五四开始，几十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马列主义的运用，都是和本民族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后，从而形成现在的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求是》苏双碧研究员)

4. 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创造的智慧的积累和延续,它的改造、更新和发展,不能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只能说对文化的鉴别和扬弃,清理和吸收,都需要有科学的态度、理性的认识,而不能动辄"打倒"和搞什么"批倒批臭"。(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

三、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

1. 认为五四运动不具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基本的要素:(1)它不是无产阶级的。五四运动中不仅没有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也没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2)它不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只反日本的具体侵略目标,并寄希望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3)它不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进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之后,并非所有革命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自发的爱国运动,它表明资产阶级已经退位,无产阶级尚未替补。所以,它既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也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开端,而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的中介。五卅运动才具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基本的要素。(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张静如教授)

2. 认为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序幕,序幕还不是开端。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陈独秀、毛泽东等一大批人都是到1920年以后才逐步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所以五四运动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张宪文教授)

3. 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不是五四运动,应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论据:(1)五四运动时,工人阶级尚未成为"自为"阶级;(2)党的《决议》写道,建国以前28年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也说明是从1921年开始。

4. 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发端于五四运动,而是南昌起义。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定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无产阶级领导权;二是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长沙水电师院学报小年、晋玺)

建党时期的研究动态

近十年来，党史学界对建党时期的研究，突破很多，成果很大，表现在：

一、对海内外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时间和地点、人员、参加和退出小组活动的具体情况均已调查研究清楚，特别是对有争议的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欧支部也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

二、对共产主义小组如何传播马列主义的历史过程已经调查清楚，但是在估价上有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是争鸣热点。

1. 传统的说法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尤其通过三次论战，使马列主义取得巨大胜利，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居于指导地位。

有人认为对这一时期的马列主义的传播不能评价过高，对三次论战取得的胜利和意义也不能评价过高，而且还有不足之处：一是在传播马列主义中夹杂着许多非马列主义的观点，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观点；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等等。二是由于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的短促，并未深入广泛传播，而主要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进行传播。三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重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联系缺乏认识，因而在传播马列主义上不免带有片面性。

2.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传统性说法是这场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有人有不同看法：

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之争，胡适本意不是提倡改良主义，而是指出当时社会风气只讲大道理而不去调研社会实际问题。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并未理屈词穷，还继续发表“三论”、“四论”为自己辩护。

二是通过论战，双方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所以，胜负究竟属谁，很难用当时的社会影响来判断。

3. 关于“社会主义之论战”，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他们坚持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同时，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社会

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给后来的实际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会议的代表、讨论的内容以及会议的波折和闭幕，均已基本查清楚。仅有一个争议点即闭幕的日期，现约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四种说法。

四、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包括陈独秀和马林的争论）等也已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

五、目前最重要的争鸣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一个涉及党的性质的大问题。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包括党史学界以及理论界都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近年来有个别人提出不同的看法，现予以介绍，供读者鉴别。

1.“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上海写作组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否定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粉碎“四人帮”后，这个观点受到了批判。

2. 1989年第3期《杭州大学学报》发表王学启、张继昌的文章，认为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一命题是套用了无产阶级正常产生的一般公式，与我党产生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他们的论据是：(1)党成立之前，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无论其发展规模还是社会影响都是有限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先进工人群体此时尚未形成，因此，党的阶级基础是薄弱的。(2)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较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完成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因此不可能在1—2年时间里将马克思主义灌输给文化水平较低的工人阶级。(3)在党成立之前，先进知识分子对工人群众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亦就不可能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种结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才能实现。先建党，然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才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的一个特点。

3. 有人主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建立的。其主要论据：(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列主义

主要是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且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播，并没有在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2)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极少，文化水准低，在党成立前接受马列主义宣传教育的为数极少、时间极短，因此并没有实现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3)从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活动、从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从党成立时的57名党员来剖析，均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只有个别党员是工人。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建立的。

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7月还是1920年8月？近来有人再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8月。其主要依据：1.1920年8月，上海成立的就是叫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共产主义小组；2.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第一个党纲，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学习和讨论；3.是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信，请他们派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一大”纪念馆沈海波）

七、关于建党时限的划分的争议，是个老问题，可是至今仍未取得统一认识。主要有三说：

1. 主张党的“一大”的召开，标志党的建立。

2. 主张党的“二大”的召开，标志建党工作的完成。因为作为一个完整形态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创建不仅需要有坚强的组织机构，而且还要有正确的革命纲领。党的“一大”从组织上完成了建党任务，党的“二大”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民主革命纲领，才从政治上完成了建党任务。目前许多学者和一些教材讲义均持这种观点。

3. 主张党的“三大”的召开，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在党有了组织，有了纲领，有了政策和策略，才能从完整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建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已故的何干之教授就是把从1921年7月至1923年12月划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见其著作《中国现代革命史》）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研究动态

几年来，党史学界对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研究成果很大，解决了不少长期